

## 论孔子私学的治道与文献之传

章柳泉

### 一 孔子私学讲的是治道

(一)孔子私学传习治道是为培养佐治人才服务的

孔子开创儒家私学,是最早的私学之一。门徒众多,对我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极深远。孔子私学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也就是“学而优则仕”的佐治人才。《学记》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句话既说明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统治者要想把国家建设好,人民统治好,首先要从运用教育这一工具来培养各种实际的佐治人才开始。佐治人才的最高要求是能通达治道以完成化民成俗的任务。怎样才能达成这项培养目标呢?主要靠“学”。《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这里所说的“道”,和后面“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以及“大学之道”,都讲的是切近人事的“治道”,是学用“化民建国”的治道。

(二)孔子私学所传习的治道以西周为主

孔子私学对三代之治都进行研究,但孔子最向往的是西周的治道。他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以后引《论语》只记篇名)这是个明证。又《礼记·表记》称孔子对三代的看法是夏代尊命,商代尊神,周代尊礼。孔子是尊礼的。西周尊礼的政治,有如下一些特点:

1、引用文明的治术。孔子称周公制礼作乐,他自己也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德治主张(见《为政》)。用礼乐道德化民,是一种文明治术,虽然主旨在使被统治者接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如孔子提倡以“孝弟”之道来防止人民犯上作乱,是为统治者利益打算的,但毕竟比用残暴的办法要文明一些。

2、实施裕民政策。周本是西方小国,一向重农节俭。克商以后,周邦旧制仍多被保存。《尚书·无逸》论治民要“先知稼穡之艰难”;《诗·豳风》“七月”之诗,讲民生日用是“王业之基”。《周礼》设官分治,其中提出“以九职任万民”,讲的便是农、虞、牧、百工、商贾等富国利民的事。这些裕民富国政策,当然是从维持统治得久远些出发,可也不能说完全是欺

骗人民的。

3、宣扬重民思想。周鉴于商代亡国教训，在许多文诰中，都谆谆以重民垂训。《尚书·无逸》说：“怀我小民，惠鲜齔寡。”《康诰》说：“惟命不于常”（意思是说要永命必须保民）。《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西周的重民思想，来源于接受教训，为的是长治久安，但确也多少承认了被统治者有一些卑贱人的权利。

西周尊礼的治道，孔子私学多所发挥，见于记载的如“文之以礼乐”（《宪问》），“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颜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季氏》），“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民无讼耳”（《颜渊》），“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等，都是提倡礼乐之教，裕民之政以及慎刑薄赋和反对横征暴敛的。

### （三）孔子讲治道顺应时代要求

孟子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虽宗西周，但不死守，他很重视时代变化，并主张古代典章制度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兴革的。他曾说：“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为政》）。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有人说“为东周”，就是要在东方的鲁国复兴西周之礼。其实是顺应时代，欲行春秋尊王惠民之政。东周已进入兼并时代，统治者更体会到天命鬼神不可靠，而可靠的却是负担赋税兵役的庶人。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见《左传·桓公六年》），从实际情况来说，在兼并时代要立国而不先施惠民之政以得民是办不到的。管子、子产是春秋时大的实际政治家，也是孔子所景仰的人物。管仲相齐也讲道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即出于《管子·教民》中。但他更重惠民的实政，这是齐国能由富强而称霸的主要原因。孔子对管仲有批评，但基本上是称赞的。子产在郑国执政，讲究外交辞令，重农事，改革军赋制度，又铸刑鼎打击贵族（郑本重商业，贵族随意用刑罚压商人）。管仲、子产的政绩在孔子私学所讲的治道中，不能不有所吸取，言语一科，就颇受子产的影响。孟子说：“王者之业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可见孔子并不反对尊王惠民的霸政，同时也是孔子顺应时代讲治道的一个证明。

### （四）孔子私学分科培养佐治人才

分科培养佐治人才是孔子私学讲治道最有力的说明。一般说孔子私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如《论语·先进》所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其实孔门之中爱教育专业的也大有人在，曾皙便是有名的一个。孔子死后，弟子开门讲学的还很多。孔子私学确曾培养出不少出色的佐治人才，颜渊等十人是最特出的，三千弟子中能通六艺说得上学而优的，至少有七十余人。这些弟子，孔子生时就有出而仕的，并有名当世。如子贡历仕鲁、卫，聘向各国，与诸侯分庭抗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鲁）季氏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孔子世家》所载楚令尹子西的话，更足以证明孔门弟子颇多佐治贤才。由这看来，孔子私学办得还是有成效的。春秋之世，诸侯为兼并而争养士，士如果贤能，很容易由下属而跻于新贵，也就是后来的客卿，可以四处投效，不受一国、一家、一姓的限制。孔子私学为诸侯、卿相输送学养有素的创业贤佐，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也足以表明他是主张“用人唯贤”的。

西周是世卿世禄制，以“用人唯亲”为主，孔子这样做，显然与西周宗法制有抵触。从这一点说，孔子办私学有一定的进步性，而硬要说孔子顽固到顶，死抱着西周之制不放，也就很难说得通了。

#### （五）孔子私学传习中侧重“人事”，并富有重民思想

过去不少批评孔子思想的人，多用孔子好讲天命，又是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来断定孔子所传的道是“天道”、“性命之道”，而有一点重民的言论，也是巧伪人用来骗人的。是不是完全如此呢？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错，孔子是说过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一类的话，但在《论语》中，讲这一类的话是不多的。同时，他也说过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把天看成是自然的话。对鬼神更多采避而不谈的态度。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还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都说明孔子教弟子重在讲生人之事。孔子私学为春秋各国培养佐治人才，这时靠人不靠天的思想突出，而诸侯卿相所需要的是能经世致用的创业贤才，孔子私学怎能不讲切近人事的治道而大讲天道，不培养通人情、达物理、有实学、能实用的真才，而把力量用在空讲心性的内求方面呢？

至于说孔子讲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孟之道就是以无条件忠君为第一义，因而不会重民，这也得具体分析。孔子是坚持贵贱尊卑等级制的人，但据《礼记》、《论语》所载，并不象秦汉以后儒家那样把帝王看成是绝世之贵。《大学》中所说的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是把君臣关系说成对等的。《论语》中所载的：“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也是相对的。《孟子》书中就讲得更露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讐”（《离娄下》），乃至提出“民为贵，让社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命题。这些话在后儒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而孟子却坦然出之，这是什么缘故呢？又孔子讲正名，偏偏乱臣如叛季氏的公山不扰和叛晋的佛肸召孔子，孔子都想去，这又怎样解释呢？最近《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发表了林志纯同志的“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一文，很能说明问题。文中说孔子、孟子时代没有统一的帝国，没有专制制度。天子不过是五等爵（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中的一级，是在五等之内而不在五等之上。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正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是城邦制国家。尧舜时代是产生城邦制的前夕，三代时代是城邦制各自发生的创始时代，五霸时代是城邦制全盛时代，战国时代是城邦制衰落时代。城邦制国家具有古代原始的民主，中外都一样。中国古代史都把古代写成是没有民主制的，因此就把孟子所说的“民贵君轻”，看作是空想乌托邦。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为君的作恶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就把他去掉，只是由于是国君，《春秋》记载用“弑”来以示区别，其实就是杀。鲁昭公被季氏逐出，死在国外，赵简子问史墨，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齐崔杼弑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说：“君民者，奚以陵（虐也）民。”这都是史实。孔子活动于城邦制全盛时代，有点原始民主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后世儒家提出的“君权神授”或“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那是董仲舒为了发展、巩固君权，或者程颐为了挽救封建专制制度走下坡路，都是在中国已有了统一帝国，封建专制制度

已经确立以后的事。活动于春秋时代的孔子，虽也提倡人伦之教，主张有尊卑贵贱之序，但并没有把君权看得那么重。“天子圣明，臣罪当诛”，或“不守君臣之义便为天理所不容”的意识，在城邦制下是不会产生的。

## 二 孔子私学传习文献提倡博学

### (一)孔子有功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传递

孔子私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又说：“孔子晚而喜《易》。”“乃因史记作《春秋》。”《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里所说的“文”，就是六艺之文，也就是古代文献知识。这些文献，内容丰富，但主要都是讲治道的。孔子有功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几乎是一种不争的公论。《孔子世家》所说的一段话是可信的。孔子整理古代文献，曾做过一番调查工作，周、鲁、杞、宋等故国文献，都采访过，以求信而有徵。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述而》），其实他在整理文献时，订《周礼》、编次《尚书》、删《诗》、作《易》系辞、修《春秋》，并不是完全“不作”，多少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不过基本上孔子是实事求是的，不随意篡改文献。就以从三千多篇《诗》删成三百篇而言，除了保存古代英雄史诗风格外，像男女相爱的情歌，讽刺朝政的篇章等，也没有删去。

经孔子整理过的古代文献，号称《六经》，不仅在孔子私学里作为教材，师弟相与讲习，而且还由孔门弟子广为传播。子夏在西河讲学，便是有名的传儒经的大师。当时缺书写工具，多耳口相传。荀子系先秦晚出的儒家，熟悉六艺，西汉儒家的经学，大多数得自荀子弟子的传授。

### (二)孔门六艺之教为的是通治道、经世致用

六艺是古代文献，所载的典章制度，兴亡之迹，风土人情，都是研究治道者所必需掌握的知识。宋代道学家以醇儒自命，说是独得儒家正统的真传，把六经强调为传性命之道的秘籍，提出从《大禹谟》中摘出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为儒家道统的心传，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与朱熹同时的浙东事功学派的陈亮、叶适，就有力地抨击了程朱“道统”、“绝学”的谬论，并指出六经不过是史乘。陈亮在他所写的《三纪年序》中，已表达了《易》为古代史、《尚书》为三代史、《礼》为周代史的意思。叶适在他所写的《进卷·总论》中讲得就更加详细。陈、叶的见解，递传至清代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则明白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点。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的一段话，更是既说明了孔门六艺之教是为学治道服务的，也说明了孔子私学虽创于“学术官守”破坏以后，却仍保有学政事的遗意，与南宋以后的理学教育大不相同。

孔门讲习六艺之序，首先是理解六艺之文，从中积累有关建国治民的知识。但这只是小成。要真的成为佐治人才，还要从大量历史文献中领会原理、原则，结合实际，变化应用，进入“知类通达”的大成阶段。因此孔门除重历史知识外，还要求弟子多接触实际，多见多闻，多向人请教，也要钻研器物之理，有一些自然界知识。《论语》书中所载，如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等，都属于

这一方面。孔子不轻视一技一艺之能，子路问“成人”，孔子特别提“冉求之艺”（《宪问》）。《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以与人共者，非独有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指的是实用的书判之文。孔门弟子能弦歌，能射御，娴于书数文章政事，是多才多艺的。

在博学的基础上讲究经世致用，是孔子私学培养佐治人才的要旨。孔门虽重六艺之教，并不拘守文献，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礼记·中庸》载孔子的话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今用之”三字，便含有“古为今用”之意。学习周礼一类历史文献，当然要明瞭一些治迹，更重要的是能从中通治道以为今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说：“著史明道”。明的是什么“道”呢？他说乃是“以达王事而已”。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也说纂史书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代道学家把六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之书，一字也不能更易，不是孔子之教。

宋代以后的理学教育，占正统地位近七百年，使人忘了孔子私学注重经世致用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佐治人才这一优良学风。但这一优良学风，却颇为有识的教育家和学者们所重视，并付诸实践。隋代王通，著书讲学，门徒千余，他是以使学者“受王佐之道”为学旨的。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等这批佐唐太宗兴业的人才，都出自他的门下。北宋王安石更突出。他主张人才要靠学校培养，行三舍法，以《三经新义》为教材，来造就实行新法的贤能之士。“三经”是《诗》、《书》、《周礼》；“新义”是按当时实际政治情况敷陈和发挥原三经中的道理。重要的是不死守旧义而以变法图治为主。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说：“三经新义，尽出于荆公元泽（王雱）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盖荆公生平用功于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熙宁）丰（元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可见王安石是继承孔门以六艺之教来作育经世致用的佐治人才的。

### （三）孔子私学经世致用的好学风，流传不衰

道学创于程颐，其时还不能与王安石新学抗衡。理学教育是朱熹宗程颐由订“白鹿洞书院学规”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扶植纲常之道，有利于驯造顺民，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才成为正统教育。这种教育在南宋端平以后，所教的已是朱学的糟粕，是最不利于政治、经济、学术的发展，也是最斲丧人才的。朱熹生时浙东学者们就不以理学教育为然，主张实学实用培养经世致用人才。金华吕祖谦兄弟，主持丽泽书院，重文史，守中原文献之传。永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治经制之学。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称赞他们：“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永康陈亮治皇帝王霸之学，以史学为主。叶适称他：“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数，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传，故不能开物成务。”（见《龙川文集序》）他们是事功学派，极重视作育佐治人才。叶适的大弟子王象祖，写过一首诗：“皋夔周召佐中古，萧曹房杜兴汉唐，因事因时修治效，不谈道学又何妨。”这首诗最能说明这派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理学教育是对立的。陈亮、叶适对理学教育糟塌人才，批评尤为深刻。朱熹晚年最恨浙学，因为浙学动了“道学”的根本。他用“功利之学”贬低浙学地位，但不能不感叹事功之学已行到江西，信者很众。

南宋学术之会，朱学、陆学、浙学三派鼎峙，各有传人。朱学一派的后继者，有不少高明通达之士，并不死守朱学，也无门户之见，他们吸收浙学之长，研究经制史志。如黄震、

王应麟、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都如此。黄震的《东发日钞》，王应麟的《困学记闻》、《玉海》，尤称考订经史的名著。王应麟的再传弟子袁桷，批评朱学末流之弊，不亚于陈亮、叶适。许谦讲学时，已重文章，与许谦居于师友之间的张枢、吴师道，都有文名。但文章也还是重经世致用。宋濂文章为世所重，是因为有明一代典章制度的制作，多出于宋濂之手。宋濂列为北山学派，可是他的老师之一吴莱，却传自陈亮学派的何风。何、吴都是既擅文章又深通经制之学的，宋濂文章雅驯不佻，是有经史之学做基础的。

清初以黄宗羲为首，包括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在内的“浙东学术”一派，是以史学为主而以经世致用为学旨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这个学派受南宋事功之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于文献之传，有巨大的贡献。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全祖望以十年之力根据黄宗羲原稿补纂成的《宋元学案》，是我国学术史的创举。万斯同对修《明史》提供大量文献，增高《明史》的质量。全祖望所作《经史问答》，阮元认为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埒。顾炎武是清初经学大师，“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源究委，考其得失”（见《清史稿》）。顾著作很多，《日知录》三十卷，积三十余年而成，尤为精诣之书。他曾提出“用古筹今”、“明道救世”的主张，是极重古为今用的。王夫之也是清初大师，对历史极有研究，所著《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最有卓识。他主张古为今用，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同时他也反对泥古非今，曾说：“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于商周，成周一代之规，初不上因于商夏。”（见《船山遗书》）明末清初这几位大学者的共同思想是主张正确理解儒家经典，注重研究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以达经世致用的目的，其中还包括有意图匡复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宋明空疏理学教育的批判。

清代乾嘉之际，汉学大盛，是学术界一个新的转变，表现在理学的式微和学术领域的开拓。黄宗羲、顾炎武是清代汉学兴起的启蒙大师，经胡渭、阎若璩等的努力，考据益精，不仅古籍的真伪，注释的正误，得到精密的审查，并由治经而引起一系列的专门研究，发展为小学、史学、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目录等专门学问。全盛时期惠栋的门人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戴震的门人段玉裁、王念祖、王引之、任大春、卢文昭、孔广森、凌廷堪等，都是在学术上作过很大贡献的人才，而戴震尤称朴学的集大成人物，曾任四库馆纂修五年。乾隆间书院的讲习已有所改变，象江宁的“钟山”，扬州的“梅花”、“安定”，苏州的“紫阳”等大书院，都以课经史辞章为主。嘉庆间阮元创“诂经精舍”于浙江西湖，祀郑玄、许慎，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书传条对，不用扁试糊名法，东南人才一时称盛。如姚文田、陈鱣、洪颐煊、洪震煊、朱一新、黄以周、吴承志、章太炎、崔适、戴望等，都以学问名家。“精舍”曾刊文集，内容丰富。许周生说：“所载于古今学术，洞悉本源，折衷无偏，实事求是，是以发明坠义，辅翼经史”（见张荃：《诂经精舍志初稿》）。在后如广州的“学海堂”、“广雅书院”，上海的“诂经精舍”、“龙门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武昌的“精心书院”，长沙的“校经堂”，成都的“尊经书院”等，都仿效西湖成规。理学最初在这些高级书院中被排斥，其后虽备一格，已居附庸地位。

清初文网严酷，聪明才智之士，不能谈匡复，多在学术上求发挥，这便与讲理学的习为无用不同。就在朴学盛行时，有识的大师也不忘救世。戴震就曾把考据训诂的工作看作是渡

江河的舟楫，登高山阶梯，不是为学术而学术。道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亡，龚自珍等今文经学派忧时之士，代朴学而兴，便公开援古论今，呼吁救亡图存。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曾说：“周人有六艺之学，有专官之学，皆经世之学。”梁启超办“时务学堂”，也说过：“春秋经世，凡学焉不足为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俱见《长兴学记》）

孔子私学传文献，讲治道，作育经世致用人才的好学风，在南宋以后，为理学教育所干扰，但理学教育毕竟淹没不了好学风的发展。如前段所述，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代有传人，潜力极大，不仅在清代中叶终于击溃理学教育，而且对孔子私学好的学风也有所发扬光大。重视文献不始于南宋，但经南宋事功学派的提倡，对文献的收罗、考订、整理、保存，代有增强。到了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修纂文献，分经、史、子、集四部，不主一家，历十年之久，共收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名曰《四库全书》，典藏之富，为世界各国之最。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滥觞于孔子私学。从这点说，孔子私学也是应该受到称赞的。

### 三 结 束 语

最后我提三点意见以作本文结束：

1、孔子死后，儒家已开始分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变再变。特别是宋代道学家，竭力宣扬他们得儒家道统不传之秘，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又由于宋明理学教育，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居正统地位达数百年之久，更使人误认孔子私学专讲道德性命。因此，我们研究孔子私学教育，要以可靠的文献为依据，进行分析，还它的本来面目，尤其不应把理学教育的弊害，强加在孔子私学身上。

2、古代学者，不那么纯粹。拿孔子来说，他有唯心主义的思想，也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有不少保守落后的地方，可也不是一点进步的东西都没有，作育人才，经世致用，主张用人唯贤，总是可取的。在教育工作方面，他说过生而知之的话，却也讲过好学敏求的话。因此，我们对孔子私学的研究，要从孔子相互矛盾的言论中，找出他主要着重的是什么？用来施教的大量的指导言论是什么？要实事求是作具体分析，千万不可抓住错误的一点加以扩大，以概其余，把许多可取的东西全部否定掉。

3、传孔子私学讲治道，传文献，注重经世致用一派的学者，代有其人。他们对文献之传有极大的贡献，对治学和作育人才，更有极优良的学风，这些大师们，好学不倦，都主张实学实用，开物成务，并提携后进，爱惜士类。在治学方面，态度严谨，重创发，去陈言，不苟同，不掠美。同时他们又提倡师友讲习，相互争辩，但不存门户之见，能尊重别人，综合各家之长。发为言论，或著书立说，必有根有据，实事求是，达到“理备事足”的程度，绝不以意为之。对文献极为珍视，用大量精力积累、考订、整理、保存，务使精确可信。这些好学风，对孔门之教有所发扬光大，但也确是传自孔门。这些传孔子私学好学风的学派，过去为理学所掩，不为世重，非常可惜。因此，我衷心希望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同志们，对这些大师们在教育和治学方面的成就，包括本文未论及的教育方法、教学原则等，多多进行探索并介绍出来，以丰富中国教育史的内容，并供当今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参考借鉴。